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超越

——基于资本逻辑的反思与批判

徐艳玲 李文勇

摘要：以资本逻辑为理论视域深刻检审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全球治理体系缘起于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对资本内在矛盾进行尝试救赎的结果。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必然导致自身内嵌着由资本增殖强制所预设的逻辑规定，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资本化与资本全球治理化这两大“治理”逻辑的并驾齐驱。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根本弊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现实达成有原则的妥协不拒斥资本，又清醒认识到资本的野蛮不纵容资本，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资本，汇聚世界人民力量与赋能全球治理机制规制资本，重塑世界普遍交往共享资本，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资本，成为新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逻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建构性方案，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体系；资本逻辑；全球治理资本化；资本全球治理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8691（2023）05—0030—0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科学洞察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发扬胸怀天下的大党精神风范，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十年来，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此，学者们普遍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论域的学理阐释为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意义提供了独到而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应加以追问的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性质及问题根源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怎样的历史契机？在理解人类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时，恩格斯就提醒人们“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就“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而言，唯有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之运转法则揭示的资本逻辑出发，才可能获得关于当前诸多社会现

基金项目：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胸怀天下经验研究”（项目号：22ZDA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艳玲，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文勇，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实问题的具有更为彻底批判性与原则高度的认识。因此,回答以上问题,要求以资本逻辑为理论视域深刻检审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既要“知其所长”,考察全球治理体系的缘起;也要“识其所以”,在分析全球治理资本化与资本全球治理化的基础上诊断全球治理体系的时代困境;以便“求其所往”,切中肯綮地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资本逻辑:全球治理体系的缘起

全球治理体系是现代世界秩序与国际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破解全球性重要方案。作为对全球化过程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制度性回应”^①的全球治理体系究竟从何而来?一般的分析仅可略窥一斑,只有以资本逻辑这一建构现代世界“普照的光”为理论钥匙,才能深入把握全球治理体系的缘起。

全球治理体系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结果,其中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人类处于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时代,各民族、国家的治理只能算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治理,并不构成人类跨国性合作解决问题的全球治理;唯有人类建立起普遍交往、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后,全球治理及其体系才有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世界历史不是黑格尔所推崇的“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运动过程,而是随着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跨越山川海洋、建立全球联系来开拓更为广阔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世界市场一同兴起的。当16世纪以来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上的世界历史开创之后,竞争作为资本的内在本性,役使欧洲各国在17至19世纪展开了以地球为战场而争夺世界市场、广大殖民地、产品原料产地的贸易角逐与商业战争。尽管早期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在抢夺全球霸权的比拼厮杀中势如水火,但希冀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与开创世界历史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共同价值诉求又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联姻”,成立资本家“神圣同盟”,由此产生了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管理的全球治理需求。这是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不致于在争夺全球经济利益的冲突斗争中被日益增长扩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在联合中消灭,而寻求一种可以整合与凌驾于诸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试图缓和各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并将其维持在利于攫取世界剩余价值“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世界历史中产生但又自居于全球资本主义之上并且日益同人类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阐述。他指出,资产阶级凭借资本无远弗届的力量一路狂飙突进,在开辟世界历史、褫夺世界财富之后便会谋求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的集中”,即寻求“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②。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与争夺行为中出现的这种“联合”“集中”“统一”便是最早的全球治理实践,既指涉调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纷争与镇压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指向构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即将资本主义国内经济政治秩序推向世界,创造与资本主义世界相适配的国际分工与交换制度体系,从而促进全球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有序进行。这是资本通过塑造全球治理体系来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过程,其中资本虽作为开创世界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却充当了全球治理的自觉的工具。

全球治理体系也是资本主义对资本内在矛盾进行尝试救赎的全球治理结果。资本在增殖天性下展开的无止境追逐最大化利润的运动中,会不断遭遇价值增殖的历史界限,并通过危机来克服。一是资本生产为了攫取剩余价值与获取交换价值,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却忽略了人民群众实际的消费能力,由此引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而支配着商品产品,进行着社会财富的绝对积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则积累着极端贫困,财富两极分化诱发社会矛盾、动荡与失序,由此导致紧张对立的社会危机;三是资本为了增殖,丧心病狂地开采自然资源,无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造成生态系统紊乱、自然环境瓶颈突出,由此引发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作为矛盾统一体的资本,一旦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的的怂恿下走出欧洲故乡的疆界,向全世界进军,必然会乘着全球

① 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扩张的东风将自身遇到价值增殖的以上历史界限蔓延与扩散至所有“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使得资本内在矛盾固有的危机衍化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对资本增殖带来了极大挑战,严重阻碍了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对“活劳动”的剩余劳动的吮吸,而仅凭资本主义一国的力量注定是无法收拾与驾驭他们所召唤出来的“魔鬼”与“猛兽”的。于是资本主义的“魔法师们”与“驯兽师们”又一次产生了全球治理的需求,再次建立起资本“神圣同盟”,只不过这一次不再单单是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管理,还有对全球性问题进行治理,但归根到底是对资本内在矛盾进行全球治理,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治理”^①。遗憾的是,资本贪婪性与逐利性的本质决定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无法根治其自身内在困局的,只能是随着资本危机的爆发而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的历史性破产,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资本为手段与工具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其自身内在矛盾的尝试救赎是无效的。

由是观之,全球治理体系并不是人们认为的在历经维也纳体系之后才开始形塑、演化与革新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争霸称雄一同展开的实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治理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签订的契约、通约来表征的,往往呈现出局部、零散的全球治理状态,尚不构成比较统一的整体治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治理特征,这突出表现在资本家垄断同盟“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②这一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形式;直到一战后出场的国际联盟体系,才标志着整合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真正形成。但无论怎样,全球治理体系缘起于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对资本内在矛盾进行尝试救赎的结果。

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逻辑

正是资本逻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运动,才使得全球治理体系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资本逻辑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必然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内嵌着由资本增殖强制所预设的逻辑规定,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全球治理化两大根本运转机制的并驾齐驱,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逻辑。

(一) 全球治理的资本化

全球治理的资本化,是指全球治理被资本裹挟与操纵,沦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运动的一个逻辑节点,但并非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是通过使全球治理根本服膺于资本的运作,根据资本增殖需要调节全球治理,即以生产与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相适配的全球治理体系之运作过程。全球治理的资本化具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其一,全球治理主体的资本人格化主导。全球治理主体是全球治理体系拥有能动性且至关重要的元素,构成全球治理体系的成员结构,是全球治理的真正践行者。不同于地方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对治理主体身份性质的严格把控与限制准入,全球治理作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矛盾、应对国际社会风险挑战的一项全人类实践活动,诉诸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治是其独有特征与内在要求。由于资本会在商品世界中张扬自身成为主宰一切的能动主体与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必然会颠倒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关系,贬黜人为被支配的客体。因此,当资本逻辑浸染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引致全球治理主体与资本发生主客体关系的颠倒,造成全球治理主体的单一主导趋向,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代表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政治集团成为资本全球治理的“代言人”,实际主导操纵着全球治理体系;而那些与资本利益相异或与资本灵魂相悖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今天被准入为全球治理的“主体成员”,只是西方为迎合全球化时代发展国际社会民主呼声需要而诉诸的形式手段,他们只是作为“负

^① 胡键:《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1页。

责的利益攸关方”^①，成为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盘剥的全球治理对象。

其二，全球治理价值的“普世价值”化。全球治理价值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异质的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理想追求、秩序向往而达成的价值共识，是全球治理实践的重要目标引领。但因为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扩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②，代表西方世界“光辉与文明圭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也随着资本的世界历史运动被冠以“普世价值”而高歌颂扬。因此当资本逻辑染指全球治理体系时，由世界各国共同价值主张及彰显自身文明基质的特殊价值诉求而形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无情地遭到了西方“普世价值”的攻评讨伐与空间挤兑，凝聚在全球治理价值中各民族国家共同但有异的价值主张完全被无视甚至消解了，各国价值诉求中的一切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文明基质都被抹灭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民主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模式也随之输出到了全世界。全球治理体系盛行的“普世价值”充满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是西方大国借以规范全球治理价值共识来试图达到满足特殊利益和实现统治世界的话语工具，注定难以纾解横亘在全球治理主体中的对立性思维和价值分歧，只会进一步导致全球治理价值共识欠缺并引发全球治理集体行动困境。

其三，全球治理规则的资本权力化。全球治理规则是治理主体协商议定的规范各方享受权益与履行责任义务的边界以调节全球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标准、政策、契约、协议^③，关系着全球治理方向及其制度效能发挥。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的全球化扩张势必会架构起对诸领域的普遍统治关系。在分析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支配时，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④显然，资本对诸领域的权力支配，需要诉诸有形的契约、规则来实现充分无形控制，而这些契约、规则实际上是资本权力的化身。在资本逻辑的侵入下，西方大国以强大综合国力强势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权、话语权、适用权，遵循资本利益喜好导向而选择是否遵守、修改与罢免，使得全球治理规则异化为为了资本主导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这种无视与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关切的全球治理规则预设，引起了强烈不满，如若继续如此，将会极大降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意愿。

（二）资本的全球化治理化

资本的全球化治理化，是指资本流向并栖居于全球治理体系，将全球治理纳入资本运动过程，通过主导与控制全球治理来为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开辟新的有利条件。全球治理成为资本新的寄生之地，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在宰制全球治理中确保与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而造就了资本的全球化治理逻辑。资本的全球化治理化具有以下三种实现形式：

其一，全球治理客体的资本设置。全球治理客体是全球治理应解决各类全球性风险问题，但在资本逻辑的增殖强制下，某些显性或隐性的世界公共性议题之内涵与外延被“莫须有”生产，为资本的全球化治理创造条件。也就是说，通过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创造新的话语噱头来引导全球治理方向，为资本的全球化治理提供新的便利，从而实现资本逐利和增殖的内在要求。对此，西方采用的一贯伎俩是，利用全球治理的时空场域针对他国设置诸如“中国霸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论”等奇谈怪论的治理议题，再倾尽掌握的国际主流媒体平台之力来加以传播、讨论、歪曲、污蔑，借助资本话语霸权与“普世价值”标尺随心所欲地恶意诋毁他国政策、制度与模式，致使国际舆论掉入西方预设的话语陷阱，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有关议案、责任范围划分以及秩序规则设计按照西方轨道加以运行，维护与巩固资本的全球化治理。这种做法实则是资本主义为了混淆是非、转移世人注意力，将国内矛盾危机嫁接全

① 张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③ 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2页。

球以更好实现资本自我增殖罢了，其打压非资本主义力量生长、抬高资本主义制度进而使资本主义“神话”统治永世化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这无疑会造成全球治理客体的片面治理，导致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

其二，全球公共产品的资本操纵。全球公共产品是具有普惠性的物品、资源、组织、机构、倡议、规则或政策，是对全球治理客体进行诊断而开出的药方。提供与打造全球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多元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大国更是应在其中担负着首要责任。但在资本逻辑的蛊惑下，西方大国将资本食利天性的丑恶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美国由于霸权实力的相对衰败特别是全球治理边际效益的递减，一再放弃或降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一味奉行“美国优先”原则，非但没有承担应尽的大国责任，反而上演了一幕幕推诿、委罪于人的不负责任行为，肆意通过“退群”“毁约”“断供”来逃避应承担的责任。而 G7 成员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唯恐天下不乱，醉心扮演着继续“拱火浇油”者的角色，给原本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由于受到美国长期以来的渗透、扶植和控制，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公”的属性而成为了大国的“私物产品”^①，沦为资本的玩物。由此带来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使得全球治理难题日趋复杂。

其三，全球治理剩余的资本剥削。资本的全球治理作为世界秩序与世界体系生产与再生产意义上的资本运动过程，实现资本增殖与“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②是这一过程的双重目的，而循着马克思认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在于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之致思逻辑来看，资本的全球治理要实现以上目的必须通过建立在对全球治理剩余这样一种“无酬劳动”的榨取与剥削，方有可能。全球治理剩余的产机理在于：在西方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所获利益仅仅补偿了甚至没有补偿他们在其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得到的绝大部分全球治理红利是通过攫取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人类普遍利益实现的，后者在这之中完成了对前者全球治理剩余的无偿获得。西方大国借助全球治理体系来谋取特殊利益的实现过程，其实是在对多元治理主体创造的全球治理剩余的一种剥削与蚕食，结果造成了全球治理成果由作为“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作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单向度流向，“中心—外围”的全球治理体系导致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这是制约纾解全球治理困局的最大挑战。

全球治理资本化与资本全球治理化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逻辑，致使实现价值增殖成为了资本全球治理的唯一关切，导致资本拜物教盛行于全球治理之中，全球治理具有的纾解全球现代性问题、促进人类普遍交往、创造人类美好社会的基本功能和崇高初衷都被追求最大化逐利的资本天性亵渎了。可以说，资本逻辑内含的增殖强制是全球治理体系内在缺陷的根源，也是引发全球治理难题的“罪魁祸首”，因而对其中的资本逻辑予以正确对待，无疑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充斥着霸权霸道霸凌色彩，既不顺应全球化时代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历史趋势，也不匹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调整，变革偏畸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时代必然。但对此需要格外注意并拒斥“自然过渡论”与“资产阶级变革论”两种极端认识。“自然过渡论”认为，由于“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③，资本在自我反对、自我否定的运动中会创造出扬弃资本的力量，并在其中自发生长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力量，因而面对资本逻辑引致的全球治理难题，人们毋须烦忧，大可任由资本逻辑大行其道，高阶的、新质的全球治理体系终会到来。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变革论”认为，资本作为现代世界“普照的光”和主导原则，任何企图与资本逻辑相抗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

① 黄河、王润琦：《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66—6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页。

案都是螳臂当车，从而主张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一方面，在资本历史极限仍未到来的今天，全球治理体系为跨国资本实现价值增殖而引起的全球治理难题，已经使人类社会陷入灾难的深渊，因此决不能采取苦等资本历史极限降临而借以资本的总体扬弃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自然过渡”；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中资产阶级下怀，因为只有继续保持和制造不公平、非正义，他们才能主导全球化发展进程，主宰世界秩序，维护和发展自身既得利益，所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也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与道德自觉。应发挥历史主动、积极作为，运用更强大的现实物质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共产党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大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人类社会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历史现实，直面全球治理难题，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创造未来美好生活的中国智慧和方案。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根本弊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现实达成有原则的妥协不拒斥资本，又清醒认识到资本的野蛮不纵容资本，通过对资本引导、规制、共享与发展的有机统一来积极匡正“资本的文明悖论”而进一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①，成为新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逻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建构性方案。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价值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凝聚各参与主体价值共识的方式引领资本逻辑的前进方向，助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共生共荣、共在共享之社会关系的时代把握，内含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禀赋。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反思、批判而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觉继承人类历史文明的价值追求，凝聚了当今世界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需要的价值共识，在根本上契合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科学发展的科学预想，势必得到全人类的价值认同，从而形成有效引导资本发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之伟大文明作用的强大精神力量。一方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与发展，裨益于人类深刻体悟并长久凝聚生存与发展之价值理念，使世界各国在践行全球治理时能以和平与发展之价值共识抑制资本增殖的非理性欲求，止息资本裹挟全球治理，推行狭隘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腐蚀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向往，进而动辄以武力解决矛盾分歧、以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谋求自我发展的骚动。全人类共同价值之和平与发展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安全共同体与人类发展共同体的建构追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彰显时代主旋律的价值共识基础，有利于引领世界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实现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另一方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与正义，契合国际关系发展的价值需要，助益于世界各国自觉树立享有国际权利与践履国际责任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引导其在开展全球治理时能以公平与正义之价值共识规训资本增殖的野蛮生长，破除资本挟持全球治理推行西方利益优先理念而侵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全人类共同价值之公平与正义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利益共同体与人类责任共同体的建构主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价值共识前提，有效引领世界各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②，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此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与自由，回应世界政治秩序建设的价值索求，有助于人类坚守追求彰显自我、解放自我与实现自我的价值理念，指引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时能以民主与自由之价值共识拒斥奉行抽象化同一的资本逻辑，反对资本裹挟全球治理遮蔽他者、消灭异己而强制推行西式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民主与自由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建构追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页。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契合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价值共识基石，这对于各国消解矛盾差异、增进相互认知、走向多元发展具有价值通约作用，能够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塑造践行多边主义、真正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天性规制

资本逻辑的一个必然趋势是，它为了实现自我增殖的“贪婪本性”需要，会“将一切现实的和虚拟的存在都变成自己的内在构件或运作工具”^①，并以此渗透、裹挟和管控人们的生活世界，力图成为人类社会的真正主宰，这是资本的另一副野蛮面孔。“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②，资本增殖的逻辑强制毫无理性可言。如若在利用资本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时，不对资本进行规范、制约，资本就会绑架全球治理体系，裹挟全球治理按照资本的逻辑一同前进，诸多全球治理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蕴含着规制资本逻辑的实践智慧。这些实践智慧表现在：一是汇聚世界人民主体力量规制资本。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中国十年多来积极付诸行动，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构建起了覆盖国家间—周边—区域等多层次命运共同体。这些多层次命运共同体，有力推动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使命自觉，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既有利于深度激发他们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也有利于将其对于人类社会前途命运更为清晰的思想认知转化为民意而反馈至各国全球治理的政府决策与国家战略部署之中，进而实现反对资本逻辑支配全球治理的野蛮冲动与轨正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二是赋能全球治理机制规制资本。在由中国发起并主导推动建立的多层次命运共同体中，往往会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为参照标准签订相应协议条约来表征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这可以有效弥补“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无确定的国际组织形态，也不存在确定的国际权力关系”^③所导致的无国际性法律制度对资本逻辑进行强制约束的缺憾，也为建立健全全球治理的资本运行体制机制与划定资本逻辑边界红线提供了坚强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科学预设的规制资本逻辑智识，将强有力地规训资本的野蛮生长与驯服资本的顽劣，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摆脱资本逻辑支配之窠臼。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重塑世界普遍交往为全球治理秩序的追求

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与开辟世界历史过程中所形塑的人类普遍交往，仍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交往关系异化的桎梏，反而借由资本全球生产和分工体系进一步分娩出“人对物的依赖”这一世界历史阶段下人的交往关系全面异化的状态，造成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存有很大程度上的剥削关系。这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强大综合国力占据着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主动，通过巧取豪夺剥削榨取发展中国家的活劳动，生产着非正义性的世界普遍交往关系。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是在理念层面上宣扬主权国家普遍平等以便将其吸纳进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在事实层面却构筑并固守着等级性、差异性的不平等交往结构^④，代表市民社会成员的西方发达国家居于“中心”，位于这种共同体权力分配的“金字塔”顶端，绝对控制着全球治理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安全体系，而代表非市民社会成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被降格为“中心”统治的纵欲工具与政治玩物，由此继续固化着“中心—边缘”的全球治理分配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纾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致力于重塑世界普遍交往正义。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世界普遍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西方“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及其带来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消除某些凌驾于他者乃至人类之上的特殊主体及其特权地位，拒绝以社会制度之异、领土大小之差、实力强弱之别、发展贫富之距为判决标准而赋予各民族国家以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人类社会或社会

① 刘志洪：《何谓“资本逻辑”——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再理解》，《哲学研究》2019年第1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8页。

③ 陈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关系再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④ 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的人类”^①立场，承认每一民族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主体成员，提倡并坚持以平等原则开展国际交往，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注重提高他们参与国际决策的话语权，实现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倡导世界各国在谋求自身利益发展时也要兼顾他国利益发展。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世界普遍交往内容的全面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抛却了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中个体以自身为唯一界域并诉诸普遍性形式联合来谋求私利的狭隘交往界限，切实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的整体发展状态，通过以破解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文明霸权、生态危机为目标，促进世界各国普遍交往创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等旧式交往思维，建构出实现互利共赢、正和博弈的合理交往范式，将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实践平台

以广泛合作的形式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均衡发展，体现了发展资本助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基于资本仍未完成为未来社会奠定坚实物质条件之历史使命的现实考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未彻底否定资本，而是正视、承认并发展资本，把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转换成暂时必然性的动力来源。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台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正确利用并发展资本来竭力根除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鸿沟、发展赤字的时代创举：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带动沿线国家进行多领域经济合作。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前提基础，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面临的障碍。对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为各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改善了全球投资环境和提升了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同时，中国还主张在加快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的过程中，密切加强各方之间的其他领域合作，努力缩小南北之间发展差距，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彼此间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助力广大国家经济发展。由于当代金融资本热衷于用货币炒作货币、青睐于股票债券交易乃至其他金融产品买卖而远离了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实体经济，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建设资金。为此，中国牵头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金融机构，专门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他们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全球联动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②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全球发展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现实窘境，中国将继续同各国“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通过利用与发展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本能天性驱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世界各国创造社会财富、生产积极性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和活力，能够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资本逻辑的宰制难辞其咎。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制度失灵”“治理失序”等一系列乱象、怪象，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在制造障碍，反思、批判与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治理遭遇重大困境的现实境遇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并坚持通过科学解释世界与现实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来追求人类解放的大党风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8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91—492页。

在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背后的资本逻辑作出历史唯物主义审视的基础上，切实地制定出了扬弃资本逻辑的具体实践方略，必将助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克服与全球治理难题的消解，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n Capital Logic

XU Yan-ling & LI Wen-yo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ak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profoundly examine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originates from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results from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and attempts to solv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s the axis of operating the capitalis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logic of capital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embedded logical provisions presupposed by the force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inds of “governance” logic of capital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capital. In view of the fundamental disadvantage that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domin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oes not only reach a principled compromise with reality but also clearly recognizes the barbarism of capital without condoning capital. It guides capital by carrying forward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gathering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empower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regulate capital, and reshaping the world’s common exchange and shared capital and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capital. These actions constitute a constructive plan to abandon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Key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apital Logic, Global Governance Capitalization, Capital Glob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宇荣耀]